

【政治学】

DOI:10.13467/j.cnki.jbuss.2022.02.008

张仲实与毛泽东交往若干史实考略^{*}

张积玉

(陕西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19)

【摘要】作为理论家、翻译家的张仲实与人民领袖毛泽东,自抗战时期在延安相识,此后在长期革命工作、理论活动中有过多交往。从1940年起至1987年逝世,张仲实主要工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编译局等中央直属机关,使其有机会或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或参加毛泽东出席讲话的会议,或在毛泽东领导的机构任职,或参与毛泽东主持的重要工作,或起草的工作计划获毛泽东批示办理,或提出的建议被毛泽东采纳,等等。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张仲实深入杨家岭中央直属机关运输队做群众工作,成绩突出,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曾被毛泽东在大会上提名表扬。他一生先后撰写多篇理论文章研究、阐释毛泽东思想,并撰有《毛泽东传略》,对毛泽东革命一生及其杰出贡献做了高度概括。研究、考察张仲实与毛泽东交往的史实,既可丰富有关两人生平思想研究的资料,亦可从一个侧面呈现毛泽东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更深刻地诠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尊重知识与知识分子、爱护人才的思想传统,从中窥见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和理论建设的历史,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中共党史研究提供鲜活资料。

【关键词】张仲实;毛泽东;宣传思想工作;党的理论建设;中共党史人物研究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93(2022)02-061-24

张仲实是1925年1月入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出版家,毕生从事党的理论建设和宣传思想工作,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进步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张仲实在20世纪20年代曾担任渭北学联、陕西省学联主席,中共渭北特支首任书记,参与组织和领导了渭北、陕西地区的大革命运动,1926年6月曾在《向导》周报发表《刘镇华治下之陕西现状及农民的反抗运动》,有力揭露了反动军阀统治下陕西社会的黑暗腐败,满腔热情地歌颂了各地农民群众的反

抗斗争。同年10月,他受党的派遣赴苏联东方大学学习深造,两年后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翻译班从事马列著作及理论教材的翻译工作。20世纪30年代,他除回国初期担任过一段中共京东特委宣传部长外,一直在上海生活书店等从事进步革命书刊出版工作,并进行马列主义理论的翻译与研究,编译和撰著了20余部理论著作和大量理论文章。1940年5月,张仲实同著名文学家茅盾从新疆脱险并一起到达延安,自此一直在中共中央直属机构或中央机关(马列学院、中央政研室、中宣部、中共中央编译局)工作,可以说,40多年间始终受到毛泽东主席、党中央的关怀和直接领导。由于长期在党中央机关从事党的宣传理论工作,

* [收稿日期]2021-10-15

[基金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张仲实文集(十二卷本)(项目编号:基金办[2014]1号);陕西省社会科学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课题:张仲实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研究(项目编号:2020DS013)。

[作者简介]张积玉(1949—),男,陕西陇县人,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西部数字出版协同创新中心咨询委员会主任,《张仲实文集》(十二卷本)副主编,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编辑出版学。

一度还曾在毛主席领导的机构任职或参与其主持的工作,从而使他有与毛主席在工作上、理论上多有接触和交集。本文拟根据笔者所掌握的相关资料,就两人交往的若干史实做一考述,以之为毛泽东、张仲实生平思想的研究以及党的宣传思想史、党的理论建设史和中共党史研究提供史料上的参考。

一、毛泽东与张仲实的相识与相知

(一)关于两人的相识

张仲实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相识,是在1940年5月底的延安。1939年3月,张仲实和茅盾一家受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时任新疆学院院长的杜重远邀请,结伴到新疆,担任该院政治经济系主任、教授及新疆文化协会副委员长。一年后,因遭军阀盛世才迫害,遂在周恩来副主席及中共新疆党组织的帮助下脱离虎口,于1940年5月26日到达延安。从西安到延安是由周恩来安排,与朱德总司令及夫人康克清一行一路同行的。抵延当天,延安各界代表齐集南门外,热烈欢迎朱总司令及茅盾、张仲实。会上,朱总司令及茅盾、张仲实、康克清先后发表讲话。到延安后次日(27日)晚,延安各界又在中央大礼堂举行欢迎晚会。据《毛泽东年谱》和《朱德年谱》等记载,毛泽东主席出席了当晚的欢迎晚会。^{[1](P191)[2](P967)}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里写道:“第二天晚上,延安各界又在中央大礼堂开欢迎晚会,毛泽东同志也来了。当他穿过观众席之间的通道来到前排时,被群众发现了,大家向他鼓掌,他举手向群众致意,然后和我们一一握手问好,又和我们一起坐在第一排的长凳上。”^{[3](P355)}此次晚会,“由吴玉章同志致欢迎词,朱总司令,茅盾先生,张仲实先生及康克清同志皆相继讲话。”这一晚,他们相互“握手问好”后,一起坐在延安中央大礼堂第一排的长凳上,一起观看了鲁艺演出的《黄河大合唱》与京剧《陆文龙》,“至深夜始散”^[4]。28日,延安文化界亦假文化俱乐部举行欢迎座谈会,招待茅盾、张仲实。^[4]张仲实在《我的经历》中写道:“到延安的第二三天,毛泽东同志曾亲自到招待所看望我们。一周以后,他在二三个服务员陪同下,又来招待所一次,谈了约一小时。之后,他还托人特地送给我们《新民主主义论》和《论持久战》两书。”^{[5](P215-216)}

对于张仲实与毛泽东的初识,张仲实的次子张复在一篇文章里提供了一些较为详细的情况:

到达延安后,“经延安交际处处长金城的安排,父亲与茅盾在延安南关的招待所里住下后,毛泽东和张闻天即去南关招待所看望他们。张闻天是父亲留学苏联时的老同学,见面后格外亲切。父亲与毛泽东则是第一次见面。”根据种种情况分析,毛泽东、张闻天去南关招待所看望茅盾和张仲实的时间,很可能是在他们到延安后第二天(5月27日)的白天,因为这一天的晚上毛主席出席了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朱总司令及他们二人的晚会,只有27日白天他们的见面,才能说是“第一次见面”,也才能算是他们到延安住下后“毛泽东即去南关招待所看望他们”。另外,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前身《新中华报》特讯《各界代表齐集南门外热烈欢迎朱总司令及茅盾张仲实两先生》报道,茅盾被称作大文学家、张仲实被称作社会科学家,在欢迎集会上他们二人均继朱总司令之后先后发表讲话,其后延安各界又于27日、文化界又于28日分别聚会欢迎、招待他们。显然,茅盾、张仲实到延安是当时的一件大事,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因此,在他们到延安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张闻天即亲自到招待所看望,是合乎情理、顺理成章的。由此,张仲实回忆里所说到延安的第二三天毛泽东亲自到招待所看望他们,应为第二天,即5月27日。

说到到延安一周后毛泽东再次来招待所看他和茅盾一家,张仲实本人回忆说:“主席长期以来有彻夜通宵工作的习惯,他先去看望茅盾,他与茅盾是大革命时期的老朋友。去看我时作了长谈。那天晚上,毛泽东来到我的住处,他身材高大,湖南口音,衣着朴素,两人的话题从我留学苏联的见闻,苏联的理论家、哲学家米丁、罗森塔尔、尤金等,上海的进步文化运动及知名文化人士的状况,谈到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关于殖民地革命的一些著作、观点,以及我翻译、编辑《斯大林论民族问题》一书的情况等等。毛泽东兴致高时,手里夹着烟卷在窑洞里来回走几下,看得出,毛泽东对苏联哲学界的情况,对苏联的少数民族问题,对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及其观点十分熟悉,他还由这些著作、观点谈到了中国革命、中国抗日战争中的许多实际问题等等。”^[6]在与毛泽东的谈话中,张仲实还谈到了其当时尚在新疆工作的胞弟毛泽民。张仲实与茅盾自1939年10月以后,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身处险境,危急时刻,正是在毛泽民等党的负责人的精心筹划和安排下,他们

才得以撤离新疆,脱离虎口,来到延安的。

就在此次见面后一周,毛泽东又托人把自己三四个月前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和1938年5月撰写的《论持久战》两书,亲笔签名题赠张仲实,并特意把《新民主主义论》一文第四节“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手稿留给张仲实,意思是要他对文稿提出一些意见,以便日后该书再版时考虑做修改或补充。张仲实回忆说,“毛泽东的谦虚、好学、博学,以及他为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而写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作的能力,都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6]

(二)关于两人的相知

张仲实与毛泽东的相知早于两人第一次见面、相识。考查已有相关资料可知,毛泽东知道张仲实,最早可能是在1939年写作其名著《新民主主义论》过程中研读张仲实编译的《斯大林论民族问题》之时。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参考并大段引用了《斯大林论民族问题》中有关理论、观点,以论证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写道:

斯大林曾经多次地发挥了关于论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脱离了旧范畴,改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的理论。解释得最清楚明确的,是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发表的同当时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者争论的文章。这篇文章载在张仲实译的《斯大林论民族问题》一书上面,题目叫做《再论民族问题》。其中有这么一段:

“舍米契引证了斯大林在一九一二年年底所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那本小册子中的一个地方。那里曾说:‘在上升的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下,民族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相互之间的斗争。’显然,他企图以此来暗示他给当前历史条件下的民族运动的社会意义所下的定义是正确的。然而,斯大林那本小册子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前写的,那时候民族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还不是一个具有全世界意义的问题,那时候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基本要求不是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当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自那时候起,国际形势已经根本地改变了,战争和俄国十月革命已把民族问题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要是看不清

这一点,那就未免太可笑了。列宁还在一九一六年十月间,就在他的《民族自决权讨论的总结》一文中说过,民族问题中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基本点,已不再是一般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它已变成一般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构成部分了。列宁以及俄国共产主义的其他代表者关于民族问题的以后的一些著作,我就不用了。现在,当我们由于新的历史环境而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舍米契在这一切以后却引证斯大林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所写的那本小册子中的一个地方,这能有什么意义呢?它只能有这样一个意义,就是舍米契是离开时间和空间,不顾到活的历史环境来引证的,因而违反了辩证法的最基本的要求,没有考虑到在某一个历史环境下是正确的东西在另一个历史环境下就可以成为不正确的。”

在上述引文之后,毛泽东得出结论:“由此可见,有两种世界革命,第一种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这种世界革命的时期早已过去了,还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尤其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时,就告终结了。从此以后,开始了第二种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这种革命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为同盟军。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阶级、党派或个人,又不管他们意识着这一点与否,他们主观上了解了这一点与否,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7](P669—671)

《斯大林论民族问题》于1939年3月在重庆出版,前后时隔不到十个月时间,1940年1月《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发表。肩负领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重任的毛泽东,在张仲实编译、出版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就找到《斯大林论民族问题》一书,并熟读它且在写作《新民主主义论》时大段加以引用,充分说明了他对该著在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上所具有的重要理论指导价值的看重。文中,毛泽东特别指明该著译者张仲实名字,这一直以来被理论界和翻译界普遍解读为是毛泽东对张仲实理论翻译工作的一种肯定和赞赏。张仲实是我国著名马列著作翻译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早于

20世纪20年代在苏联东方大学、中山大学留学期间,就开始了马列主义理论著作的翻译。^[8]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他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先后翻译、撰著出版的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就有20多种,其中重要的译著如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937)、《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38)、《斯大林论民族问题》(1939)、斯大林《论列宁》(1938,汉口生活书店),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1937),拉皮杜斯、奥斯特洛威强诺夫《政治经济学教程》(1936,上海商务印书馆),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初学读本》(1935,上海生活书店),米丁《哲学》(1937,上海生活书店),《苏联新宪法研究》(编译,1937,上海生活书店),柯斯明斯基《封建主义》(1938,上海生活书店),罗森塔尔《辩证认识论》(1939,上海生活书店),罗森塔尔《新哲学读本》(1940,新疆丛书二辑)等;而专著重要的如《苏联的教育》(1933,申报馆),《苏联政治制度浅说》(1934,申报馆),《苏联五年计划的执行》(1934,上海商务印书馆因怕惹麻烦未出版),《二十年的苏联》(合著,1937,上海生活书店),《现代十国论》(合著,1936,上海生活书店),《国际现势读本》(张仲实等著,1938,汉口生活书店),《救亡手册》(张仲实、孙冶方等著,1938,汉口生活书店),《走上绝路的日本》(张仲实等著,1938,汉口生活书店),《怎样研究世界经济》(1939,汉口生活书店)等。另外,除出版著、译著作外,他还上海的《时事类编》《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大众生活》《世界知识》《国民》周刊、《抗战》三日刊、《全民抗战》等进步刊物发表了大量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国际政治与经济问题、动员全民抗战、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等方面的论文和译文。尤其是他在担任生活书店总编辑期间,适时改变书店出书方向,主持出版了一大批马列经典著作和进步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在教育、引导一代青年“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9](P158-159)由上,我们也可以推测,20世纪30年代尤其到延安后,酷爱读书的毛泽东是否也还读过张仲实其他更早些的著、译作品?当然,这是需要再作进一步探讨的。

关于编译《斯大林论民族问题》一书,张仲实自己曾在回忆中说,在抗日战争初期,他联系中国的国情,有针对性地搜集了一些斯大林有关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以及殖民地革命的文献,将其中一部分翻译、编辑成《斯大林论民族问题》一书。该

书1939年3月由生活书店出版发行。张仲实在“一九三八年年终,即赴新前三日写于重庆”的《译者的几句话》中讲道:“本书是一个汇集,凡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所有的言论,都搜罗在它的里面。”“我们中国地广人众,民族众多,在我们对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抗战的今日,怎样彻底实现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对外求得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自由,对内实行各少数民族的平等,更引起各方的注意。以此说来,斯大林的这本书对于中国读者,实在有着莫大的参考价值。”列宁也曾经评价说,斯大林1913年所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该文作为首篇收入张仲实编译的《斯大林论民族问题》),在民族理论文献中是“首屈一指的论文”^[6]。

在该书《译者的几句话》中,张仲实还深入分析阐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言论的重要地位:“我们知道,在革命前的帝俄境内,居民的构成,极其复杂,大小不下百余种。因此,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不论在‘十月革命’以前或在‘十月革命’以后,在革命政党——布尔塞维克党的工作中都占着很重要的地位,路线稍一错误,就要引起民族间莫大的纠纷,削弱革命的力量。而在‘十月革命’以前或‘十月革命’以后,布尔塞维克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大政方针及实践方法,便都是由列宁和斯大林主持及决定的。我们打开布尔塞维克党史,就可以看出,该党所有关于民族问题的文件——提纲、报告、决议案,大半是出于斯大林的手的。在‘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权为了处理复杂的民族问题,政府机关内曾设立了一个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主持该部的就是斯大林。所以,斯大林的关于民族问题的言论,像列宁的一样,不论在革命前或革命后,在布尔塞维克党中始终占着权威的地位。今日苏联大小百余种民族的亲睦合作与各民族经济文化的欣欣向荣,就证明了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理论与实践的绝对正确。”^[10](P1-2)

由上可以肯定地说,张仲实与毛泽东两人在见面、认识之前,已经相知,已有思想上、理论上的交流。张仲实在担任生活书店总编辑期间,曾策划、主编了《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等,主持出版了一大批马列经典著作。尤其是1938年,生活书店还在汉口出版了毛泽东《论持久战》以及叶剑英等有关党的领导人和社会名流的著作(如叶剑英著《武汉广州沦陷后的抗战新局势》、宋庆龄著《中国不

亡录》等)。虽然有关编辑出版这些书籍,现在尚未找到可靠资料可以证明是张仲实决定或由他参与决定所出版的,但是以下几点可以说明,他当时确实阅读过并主持或参与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等书的编辑出版工作:第一,张仲实主持书店工作后,即改变了书店以往主要以生活、职业内容为主的出版方向,突出了对进步革命社会科学读物尤其是马列主义理论著作的出版。当时书店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毕云程曾回忆说:“1935年1月,请张仲实为生活书店编辑部主任,这又是一件大事。”“仲实到店后,生活书店又添了一支巨大的生力军,联系许多进步人士为生活书店写稿,在生活书店计划出版各种进步书刊上起了很大作用。生活书店有许多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书,大半是在仲实主持之下出版的。”^[11](P296)张仲实1935年1月出任生活书店总编辑,至1939年1月,始终主持书店编辑出版工作,以他当时的政治观点、出版思想和理念,毛泽东《论持久战》等著作的出版,由他负责或参与工作顺理成章,似无疑义。第二,特别重要的是,张仲实来延安后短短半年,即1940年12月就著文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是中国的最优秀的真正马列主义的作品。”^[12]由该文看,张仲实对毛泽东《论持久战》等著作是相当熟悉、推崇、有很深研究的。第三,从抗战期间张仲实有关抗战及国际政治、经济问题评论、研究的论著中,也鲜明地反映出他坚持批判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论调,主张持久战,并反复强调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观点,与毛泽东《论持久战》的看法完全一致。由此,也可以推测他当时关于抗日战争的观点,深受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影响。由以上三点大体可以推定:张仲实与生活书店出版毛泽东《论持久战》关系密切;在该书编辑出版的过程中,张仲实已读过并接受过该著思想观点的很深影响。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抗战期间撰写的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性论著。该著初步总结了全国抗战经验,批驳了抗战初期在国内占有相当大市场的亡国论和速胜论错误观点,全面考察和论证了中国能够、也必须经过持久抗战取得胜利的客观根据,科学地预见到持久的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强调战争之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无可辩驳地阐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回答

了人们思想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为八年抗战的胜利指明了方向。历史充分证明,毛泽东的预见是完全英明和正确的。

二、多次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或有其出席会议的会议

(一)多次参加毛泽东出席的延安新哲学学会举办的年会及报告会、座谈会

延安新哲学学会,是在毛泽东的提议下,由著名哲学家艾思奇和柳湜等人发起,于1938年9月在延安成立的。其宗旨是研究、学习、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1940年6月21日下午,延安新哲学学会在文化俱乐部举行了第一届年会首次会议,毛泽东、张闻天、朱德、艾思奇、茅盾、周扬、范文澜等50多人出席。刚到延安不到一月时间的张仲实应邀出席了这届年会。在会上,他继张闻天、朱德、郭化若之后做了发言。

此次会议,是为了总结研究新哲学的经验,交流研究成果,明确研究任务,提高研究水平,以更进一步地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会期原定开3个月,但并不是每天都开会,规定每星期开会一次,由会员报告研究成果。毛泽东在年会首次会议上讲话,说道:今天开这个会,我心里很高兴。回想前年开新哲学学会成立会的那一天,已两年了,工作有了成绩,今年开过了这个年会以后,一定会更好。理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注意的太不够,今后应加紧理论研究。现在人们的条件比过去好了,许多文化工作者与哲学家都汇聚在这里。必须承认现在我们的理论水平还是很低,全国的理论水平还是很低,大家才负起克服这种现象的责任。我们要求全国在这方面加以努力,首先要求延安的人多多努力。年会开了以后,新哲学的前途是光明的。^[13](P155-156)

年会首次会议从下午4点半一直开到了7点半。会后,毛泽东用其稿费在延安西北饭店请代表一起吃了晚餐。他首先举杯庆祝新哲学学会年会的召开和成功,号召大家积极学习马列主义新哲学,把传播新哲学的活动进一步推广扩大。他走到每一桌去敬酒,和每个代表碰杯,大家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此后在延安,张仲实经常参加延安新哲学学会举办的各类报告会或座谈会。他在回忆中

说道,经常看到与会的会员有毛泽东、朱德、张闻天、任弼时、艾思奇、周扬、何思敬、吴亮平、郭化若、范文澜、柯柏年等人。每次会上,与会者都能各抒己见,讨论气氛十分热烈。

(二)应约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关于整风问题的谈话会

1941年七八月间,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意见,党中央公布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延安整风进入了思想准备工作的阶段。这一阶段,一方面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汇编了党的文献《六大以来》《两条路线》,以及《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与此同时,毛主席还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分头找人谈话,进行整风前深入的思想工作。时任中央政研室主任的毛主席负责中央政研室。据邓力群回忆,毛主席找了张仲实与陈伯达、邓力群、丁佟放、于炳然五位研究人员一起谈话。据查核相关资料,一起参加谈话的五人中,陈伯达时任中央政研室副主任,邓力群任中央政研室政治研究组组长,丁佟放任中央政研室经济研究组副组长,张仲实任中央政研室国际问题研究组组长、于炳然任中央政研室国际问题研究组欧美组组长。谈话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的二层楼上举行。根据邓力群回忆,在谈话中,“毛主席着重讲了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问题,讲了两个多钟头。有些话相当尖锐,批评教条主义狗屎不如,狗屎可以肥田,教条主义肥田都肥不了。”^{[14](P64) [15](P65)}

(三)参加毛泽东出席讲话的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二届二次参议会

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南关新建参议会大礼堂举行。张仲实作为中央政研室的知识分子被推选为本届参议员出席了会议(见图1)。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以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代表,国民党中央军委驻第十八集团军的高级联络参谋等出席了开幕典礼。毛泽东在开幕典礼上做了重要演说(后来公开发表时题目是《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的演说》),他指出,参议会的目的,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演说中毛泽东重点阐述了边区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含义和各项政策,批评了某些共产党员在执行政策中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缺点,提出要加强党内教育,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7日召开预备会,选举高岗为参议长,谢觉哉、李鼎铭为副议长,并

选举产生了大会主席团,通过了大会议事规程和议事日程。8—9日,与会者听取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其他领导作的有关边区军事、财政、经济、民主建设等方面的报告。从13日起,大会穿插审理参议员提出的各种提案。20日,大会举行了选举,林伯渠当选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为边区政府副主席,雷经天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21日,在大会闭幕式上毛泽东再次发表讲话。他认为会议开得很好,总结起来有两大成功:“第一,暴露了我们许多东西,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第二,这是个很大的学习,是共产党员向党外人士学习。”他强调“党就是要集中人民的意见加以系统化,坚持下去。哪一天不去集中人民意见,不听取人民意见,即无意见,便要腐化,便要没有前途。”毛泽东最后指出,“今后要切实做到上下一致,言行一致”。“党外人士有批评的自由,有写信、登报的权利;讲得不对也要讲,否则就不叫自由。”^{[16](P265-268)}



图1 1941年11月当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证件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于1944年12月4日至19日在延安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召开。张仲实与203名议员出席大会,朱德、陈毅等出席了开幕式。林伯渠在5日的大会上做了题为《边区民主政治的新阶段》的工作报告,总结了三年来边区民主建设的巨大成就,分析了边区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民主政治在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12月15日,毛泽东主席出席大会,发表了题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重要演讲。他指出:整个反法西斯战争有了很大胜利,打倒希特勒明年就可以实现。我们唯

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但是中国内部的状态仍然是不团结,国共谈判毫无结果,国民党仍固执其一党专政及失败主义政策,因此全国人民的总任务是一致起来大声疾呼,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变现行政策,迅速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只有促成国民党、共产党、其他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在民主基础上召集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才能统一中国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并配合同盟国,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他提出了1945年解放区的15项任务,主要是:巩固或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整训和扩大正规军、游击队、自卫军和民兵,加强军队的内部团结;加强民族统一战线,认真执行三三制政策;深入开展减租运动,普遍开展大规模生产运动;重视知识分子,注意文教工作,提高干部能力,用各种办法促成民主联合政府建立。他特别强调,党内党外都要大力提倡民主作风,要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两条原则。他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必须树立民主的工作作风。在此次大会上,周恩来、董必武、陈云、彭德怀等分别做了《关于时局和国共两党谈判问题》等发言。19日,大会通过提案后由副议长谢觉哉致闭幕词。^[16] (P376-379)

二届二次参议会大会充分表现了边区民主政治的特色,参议员在会上畅所欲言,坦率批评政府工作中的缺点并提出改进办法。会议为协调抗日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增强团结,促进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进程,推进大后方人民民主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作为劳动模范参加了毛泽东作报告的陕甘宁边区英雄劳模代表大会

关于当选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和出席英雄劳模大会,张仲实在《我的经历》中写道:“1942年开始整风运动,我响应毛主席号召,业余做机关的群众工作——到杨家岭(党中央直属机关所在地)运输队,给运输队员讲抗日形势,教他们识字、唱革命歌曲,帮助他们记账。该队队员的政治觉悟、工作积极性大大提高,运输队成为延安各单位运输队的模范。1944年我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见图2),出席了劳模大会。大会上还给我发了奖品——毛毯一条、毛衣一件(区梦觉同志手织的^①),毛巾两条、肥皂两块。毛主席一次在中央党校礼堂作报告时还提名表扬了我,我因此也被推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员。”^[17] (P48-49) 作为理论

家、翻译家,张仲实1940年5月到延安后,一直受到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重视,先后被安排在马列学院、中央政研室、中宣部承担重要工作。他工作认真负责,为人谦虚朴实,尤其注意自我思想的学习提高。在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期间,他自觉践行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指示,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深入杨家岭中央机关运输队做群众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绩,受到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李富春的赞扬,被树为中央直属机关先进典型。李富春在1944年5月2日致张仲实的信中说道(见图3):“仲实同志:第一季总结写得很好,这里不仅实际而生动地介绍了运输队,而且特别重要的是你的大进步,思想作风上的大进步!这个收获在党的利益来说,一个大知识分子的进步与改造比一个运输队的改造是大得更多更多的。”^[18](插图) 1944年4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张仲实撰写的《模范运输队是怎样更向前进着——记我所看见的杨家岭运输合作社社员大会》,生动细致地叙写了运输队如何改进生产和管理、给工作带来了新面貌、新气象。同年11月17—18日,《解放日报》又连载了他的长文《新的摸索——延安杨家岭机关杂务人员文化学习的初步总结》,文章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分“今年的成绩”“学习文化对于工作的帮助”“生产训练班和大课的作用”“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教学方法上的创造”“缺点”“要更前进一步”七个部分,全面总结了中央各部委室知识分子用办训练班、交朋友等方式,帮助杨家岭中央机关杂务人员学习文化、提高思想政治觉悟,使之成为自觉的革命战士的经验。由上可见,张仲实当选劳动模范,被毛主席大会提名表扬,实际上是党中央为当时延安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所树立的一个典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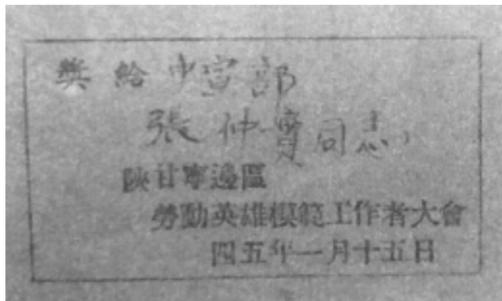


图2 当选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模范的奖励证书

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于1944年12月22日至1945年1月14日在延

安召开,张仲实作为劳动模范参加了大会。大会于12月22日开幕,476位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代表和500多位来宾及旁听者参加了会议。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致开幕词。到会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在小组会和大会上发言,讨论了边区建设问题,交流了工作经验。大会隆重表彰了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以及5个先进集体,并颁发了奖金、奖状和奖旗。1月10日,毛泽东出席大会,并作了《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的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作了充分估计,他强调指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在边区人民建设事业中起了三种作用: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16](P379-381)

朱德、彭德怀、高岗、李鼎铭亦分别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民政厅长刘景范作《更加推广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的运动》的总结报告,李鼎铭致闭幕词。会议于1945年1月14日闭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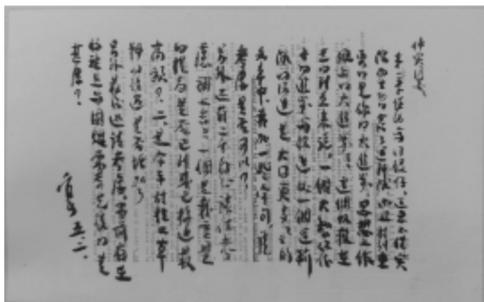


图3 李富春1944年5月2日致张仲实的信

(五)参与了党的七大秘书处工作、作为列席代表出席了党的八大、十二大等重要会议

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中央指定张仲实在大会秘书处工作,任速记组组长,在该组工作的还有冯铨、罗青长、徐明等人。速记组的任务主要是核对大会上所有发言的速记稿。张仲实虽不是大会的代表,但他却参与了此次大会的许多重要活动,听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刘少奇副主席等的重要报告以及所有大会发言。张仲实在回忆中写道:“中央这样安排,是對我政治上的极大信任和鼓勵。”^[17](P48-49)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为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了121万名党员。毛泽东致大会开幕词,指出: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他在会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

告、关于形势和思想政治问题的报告、关于讨论政治报告的结论和关于选举的讲话;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报告。任弼时、陈云、林伯渠、彭德怀、张闻天等作了大会发言。七大确定了以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巩固与团结,为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人民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打下了牢固的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

1956年9月15日—9月27日,党的八大在北京政协礼堂召开,张仲实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了会议(见图4)。毛泽东主席在大会上致开幕词,他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党的八大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后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对七大以来11年间党的工作、特别是建国以来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丰富经验,做了系统的总结,充分肯定了七大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分别作政治报告、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会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做了重要发言。1982年9月1日—9月11日,党的十二大在北京召开,张仲实亦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了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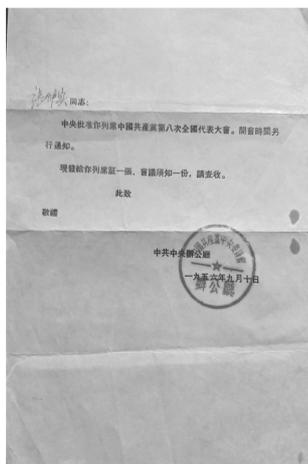


图4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张仲实作为列席代表出席中共八大的通知

1964年12月,张仲实作为社会科学团体代表,被推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2月20日—1965年1月5日出席了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列席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

议推举毛泽东为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主席。1978年2月、1983年6月,张仲实被推选为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并当选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 (P1-30)}

三、在毛泽东直接领导的机构任职或参与了由其主持的工作

(一)在毛泽东任主任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担任国际问题研究组组长

1941年9月,中央设立“中央政治研究室”,毛泽东任主任,下设四个研究组,张仲实担任国际问题研究组组长。

关于中央政治研究室,过去不少人仅知道这一名称,但对该机构的具体情况知之甚少,而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及一些文章中的说法各有不同。张仲实在《我的经历》中写道:“1941年7月,中央决定把马列学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该院分设八个研究室:哲学、马列主义、国际问题、经济学、文学、党史等。我和和培元同志任国际问题研究室正副主任。”两月之后,“1941年9月,中央设立‘中央政治研究室’,由任弼时同志任主任,陈伯达任常务副主任。我被调去担任国际问题研究组组长(该研究室共设政治、经济、国际问题三个研究组)。”^{[17] (P48)} (此处关于任弼时任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之说有误,政研室主任由毛泽东兼任。)根据《张闻天年谱》,中央政治研究室下设四个研究组,而能够具体、准确说清中央政研室情况的是李忠全《中国社科院老干部参观团活动纪实》一文,该文写道:

据许立群、彭达彰、史敬棠等同志回忆:当时,党中央在延安为了了解国统区动态,及时掌握敌人活动的主要情况,决定于1941年在杨家岭成立中央政治研究室,这是对外的称呼。对内叫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为主任,陈伯达任副主任。中央规定的任务是:“收集材料,提出意见,供中央参考。”为有利于开展工作,研究室设立学委会,由邓力群、彭达彰、周太和组成。政研室下设四个研究大组和一个资料室。

政治组:邓力群任组长,李兴清为副组长,成员有安平生、许立群、周泰和、吴俊阳、孙鸿志等。该组专门研究政治动态及形势。

经济组:丁佟放任副组长。组长不清。经济组分四个专业组,分别研究工农业及财政金融、商业等:工业组有刘明夫、彭达彰、田家英、庞继云;农业组有陈传刚、史敬棠、曾彦修、王惠德;财政金融组有张云天、廖盖隆、董边;商业组有詹武、褚太乙等。

国际组:张仲实任组长,成员有黄觉明、徐达生、胡维德等。

敌伪组:李初梨任组长,成员不清。

此外有资料室,统管全研究室各组资料。

这是党中央为研究敌情、制定政策设立的第一个研究机关。期间,由开始的30多人发展到80多人。可见当时对研究理论高度的重视。^[20]

上述许立群、彭达彰、史敬棠等三位均为中央政研室的研究人员,而《纪实》的作者李忠全长期在延安革命纪念馆从事党史研究工作,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中心主任、陕西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等,是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其文中所述史实应是可信的。

另外,刘益涛《毛泽东在延安纪事》一书认为:“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毛泽东兼政治研究室主任。”^{[13] (P209)} 按照该书所述,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应是中央调查研究局下属的机构之一,而不是独立研究机构。这与李忠全上文所说中共中央政研室与中央调查研究局是一个机构、两种叫法的说法相异。据1938年到延安马列学院编译部从事马列著作翻译、之后又在中央政研室、中宣部工作的何锡麟回忆:“1941年‘中央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决定’发表后不久,大约在同年夏,中央决定解散马列学院,我们迁到延河对岸的杨家岭,到新成立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由毛泽东同志兼任,下设政治、经济、国际问题三个研究组。张仲实同志任国际问题研究组组长,我和王力同志(原河北省副省长、40年代中曾任周恩来同志秘书,已于1972年逝世)、胡韦德同志等三人组成世界经济研究小组,我任组长,是国际问题研究组的组成部分。”^{[21] (P354-358)} 何锡麟上述回忆,与《欧风亚雨 虎穴龙潭——抗日救国传奇人物于炳然传》一书中的说法基本相同。据该书所述,中央政治研究室成立之初,康生和李克农曾找于炳然谈话,要调

他到中央情报部工作。于也表示同意,但是,张仲实却坚决要他去中央政治研究室。为此事,张仲实向陈伯达(时任中央政研室副主任)谈了要求,陈伯达又向毛泽东主席做了请示。最后确定于炳然到政治研究室工作,任欧美组组长(应为国际问题研究大组下之研究小组,与上文何锡麟任小组长的世界经济研究组属同一层级)。1942年3月,他终被调任中央情报部任第四室(政治研究室)代理主任、调查研究组组长。于炳然有在国外留学生活、从事党的工作的经历,喜欢研究国际问题,工作态度认真严谨,总能拿出最佳研究成果。^[22](P173-175)综合分析已有各种说法,可以发现大家一致认同如下事实:1941年9月中央在杨家岭成立了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室主任由毛泽东主席担任,研究室下设四个研究大组,张仲实担任国际问题研究组组长。他自1941年9月中央政研室成立起,至1943年春天一直在毛泽东主席领导的这一机构工作,整风运动的后期才被调到中央宣传部继续负责20卷本《列宁选集》的编译和校订工作,并主管解放社。

(二)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的编辑工作

1942年2月1日和8日,毛泽东先后做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个重要报告。自此,为时五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拉开了序幕。几天后,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办公楼小会议室召开会议,研究《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的编辑工作。张仲实与陈伯达、艾思奇、柯柏年、丁玲、舒群、温济泽等人参加。据曾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学术秘书的温济泽回忆,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中有关思想方法的论述摘录出来,系统地编成一本书,书名可以叫做《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而编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帮助同志们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以此作为武器,来整顿我们的学风、党风和文风。”毛泽东指出,该书的编辑任务由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完成。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副主任陈伯达,另有张仲实、曾彦修参加编书工作。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艾思奇,另有温济泽、陈唯实等参加工作。编书工作先是搜集了延安以及在延安能找到的外地出版的马、恩、列、斯著作,包括外文文本。然后每人一本或几本,摘录其中有关思想方法的论述。抄好后,分组互相校对。最后统

一交陈伯达作总的编辑,最后由毛泽东审定。^[23](P23-24)据时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国际问题研究组组长张仲实回忆:“会议决定,大家分头找材料,由陈伯达整理编辑,然后送毛主席审阅。后来,毛主席看了陈整理的初稿,认为不适用,他自己又重新作了编辑。后来社会上流行的,就是毛主席亲自编辑的一本。”^[17](P48)

1942年4月22日,《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由延安解放社出版。“本书编辑委员会”在《例言》中指出,该书“是在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号召之下编纂起来的,目的是要帮助同志们掌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来整顿我党的学风、党风和文风,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战斗。”全书以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为《代序》,共分四章:第一章《绪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特点》,下分四节;第二章《理论与实践》,下分十四节;第三章《历史科学的创造》,下分十一节;第四章《国际经验·民族特点·革命传统》,下分四节。^[24]全书共约20万字。此后,该书曾作为整风学习的重要文献之一,在延安及各解放区大量印行,并于1949年收入“干部必读”十二种书,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后很长一个时期党员和干部理论学习、理论教育的重要读本。

四、张仲实拟定的两份工作计划获毛泽东批示同意

(一)张仲实整理拟定的《纪念和追悼韬奋先生办法》获毛泽东批示“照此办理”

1944年7月24日,杰出新闻家、政论家和出版家邹韬奋在上海病逝。作为曾在生活书店工作的同事、挚友的张仲实受周恩来安排,于9月28日起草了党中央致邹韬奋同志家属的唁电。^②唁电对韬奋的逝世表示了沉痛的哀悼,对他的政治活动和事业做出了高度的赞扬和评价。唁电中指出:“韬奋先生20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至最后一息,犹殷殷以祖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谨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25]

邹韬奋先生逝世时,上海尚在日本侵略者的魔掌中,不能公开发表他逝世的消息。直到1944

年10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才公布了这一噩耗,并发表一篇社论。此后各解放区才举行了邹韬奋先生追悼大会,而在各地的追悼会中,尤以延安的最为隆重。

据参与延安纪念和追悼韬奋先生活动的李文《延安各界悼念邹韬奋先生纪实》一文所述,11月10日前,周恩来、陈毅及周扬、张仲实、柳湜、李文等六人曾一起开会商讨召开延安各界追悼韬奋先生大会筹备事项,商定成立筹备委员会。会议讨论确定的委员为:柳湜、周扬、艾思奇、张宗麟、张仲实、林默涵、李文,柳湜、周扬为正副主席,张仲实为秘书长。10月11日,周恩来副主席召集同韬奋熟识的张仲实与吴玉章、博古、邓颖超、周扬、艾思奇、林默涵、李文等13人,召开了延安各界韬奋先生追悼会发起人第一次会议,讨论了纪念和追悼韬奋先生办法。会上决定的办法中有:向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议,将延安的“华北书店”改名为“韬奋书店”;向陕甘宁边区文教会议建议电唁他的家属;在延安举行追悼会,并在大会上陈列展览韬奋的著作和他所办的期刊;建议《解放日报》社在举行追悼会时出追悼专刊,专刊由张仲实与柳湜、艾思奇负责计划。张仲实根据会议记录整理拟定了《纪念和追悼韬奋先生办法》。该办法经呈送周恩来副主席审阅修改,他在“向陕甘宁边区文教会议建议”项下补充了一句:“提议以韬奋为出版事业模范”,并批示:“我们在昨天的集会上,到了十多个人,定出如上的办法。关于全国性的,已电告林、董转商沈老,关于在延安要做的,正在筹备中。你们有何增改的指示,也请告知。周恩来 十月十二”。该办法由周恩来副主席审定修改后送毛泽东主席阅批,他在“办法”原稿上批示:“照此办理。毛泽东 十月十六日”。^[25-26]

11月22日,延安各界人士及韬奋生前好友2000多人,在边区议会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朱德总司令和陈毅、吴玉章以及韬奋先生的胞弟邹恩恂等参加会议并发表讲话。张仲实代表筹备委员会做工作报告,其中提出:一,提议成立纪念委员会,办理此后有关纪念韬奋先生一切事宜,经大会一致通过;纪念委员会委员为周恩来、吴玉章、林伯渠、博古、陈毅、续范亭、杨秀峰、成仿吾、贾拓夫、柳湜、周扬、艾思奇、丁玲、张宗麟、林默涵、李文、张仲实。二,为纪念邹韬奋先生,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设立“韬奋出版奖金”,其基金管理方法的草拟,今后由筹备委员会移交纪

念委员会办理。(见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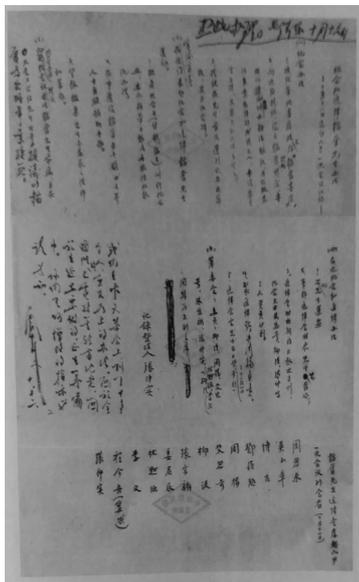


图5 张仲实拟定的《纪念和追悼韬奋先生办法》

张仲实与柳湜、艾思奇负责策划的《解放日报》悼念专刊,得以按时顺利出版。11月22日第三版刊登了萧三撰写的纪念文章《韬奋同志——文化界的劳动英雄》。第四、五、六版为纪念特刊:第四版刊登了毛主席的题词以及吴玉章、陈毅、凯丰等负责人的纪念文章;第五版刊载了朱德总司令的题词以及艾思奇、徐懋庸、茅盾、何干之、沈钧儒等人的纪念文章;第六版整版发表了张仲实《一个优秀的中国人——邹韬奋先生的生平、思想及事业》的长篇文章。

延安举办的韬奋先生的追悼活动安排井然有序,追悼大会举行的十分隆重成功。

(二)张仲实拟定的全党理论学习计划“十二种书”由毛泽东审定并定名“干部必读”

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为迎接中国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有效提升全党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央指示张仲实提出一个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计划。经与时任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商议,他选定了干部必读十二种书。^③十二种书经毛泽东审定,并由他取名“干部必读”,经中央批准印行全国,供党员、干部学习。这十二种书是:《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下册)、《马恩列斯

思想方法论》《社会发展简史》。其中《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下册)、《社会发展简史》等三种由张仲实自己编译;此外,《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为毛主席在延安时亲自主持、张仲实等收集资料和参与编辑工作,由延安解放社出版。

毛泽东主席对“干部必读”十二种书的学习高度重视。1949年3月13日,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结束时所做的总结讲话中曾说:“关于十二本干部必读的书,过去我们读书没有一定的范围,翻译了很多书,也都发了,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而我们许多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共同的认识。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27](P261)在这次讲话中,毛主席一再强调说明:“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作很好的宣传。所以现在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27](P260)

“干部必读”,从1949年6月统一版本后陆续出书,至1950年上半年全部出齐。从1949年6月到1950年6月一年间,印行总数达300多万册。^[28](P335)

十二本书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干部、党员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必备读物,对于培养教育干部、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五、张仲实提出的两项建议被毛泽东采纳

(一)建议毛主席为女英雄刘胡兰题词

1947年3月26日,毛泽东主席为在敌人铡刀下英勇就义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亲笔题词:“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见图6)。几十年来,这一光辉题词已人人皆知。但是关于题词的具体情况以往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鲜为人知。

1947年初,我晋冀鲁豫陈赓率领的太岳兵团和王震所部在晋中一带同阎锡山匪部作战,击败了其主力军,取得了重大胜利。为此,延安各界组织了一个慰劳团,前往晋中慰劳两军将士。团长是边区工会主席崔田夫,副团长为杨家岭中直机

关的代表张仲实和边区政府的黄静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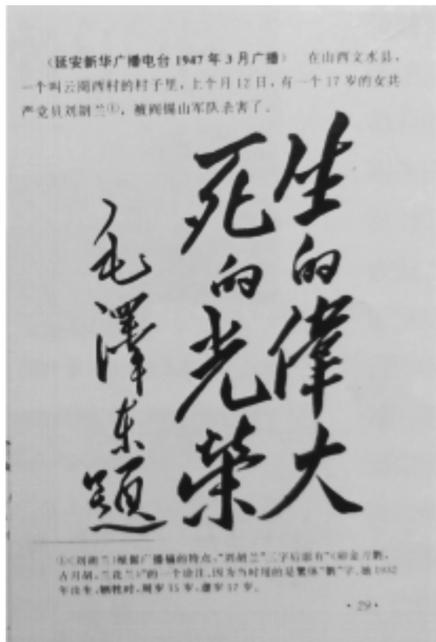


图6 毛泽东主席为女英雄刘胡兰题词

慰劳团带慰问品——羊肉5000斤,装了四大卡车,于1月13日从延安出发,路经吴城、交城、孝义,于2月12日到达文水县城,住在贺炳炎旅部。张仲实在回忆中写道:“采取措施纪念刘胡兰烈士,就是这次由我提出建议的。”2月15日,张仲实从《晋绥日报》上看到了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很受感动。此时,部队正在组织云周西村附近农民拆除文水县城的城墙,他便派慰劳团成员、新华社记者缪海棱和陕甘宁边区妇联一位同志带了几个人到云周西村向农民群众做了调查。缪海棱等寻找了该村不少群众,向他们了解了刘胡兰在敌人铡刀面前坚强不屈、英勇就义的详细经过,还找到了当时行刑的两个人。调查结果证明,刘胡兰的事迹完全属实。慰劳团立即决定买白洋布一匹、毛巾一打,派了慰劳团成员、妇联的白凌云和另外一位同志携带慰问品,前往云周西村慰问刘胡兰烈士的家属。因云周西村离前线较近,贺炳炎特派了一班人护送慰劳团前往。

此后不几天,晋中党委书记解学恭与张仲实谈话,问张:“战区应该怎样进行党员教育?”张说:“刘胡兰英勇就义,不是很好的材料吗?”过了一两天,解学恭对张仲实说:“你的意见很好,党委决定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向刘胡兰同志学习的活动,并准备给刘胡兰墓前立一块石碑纪念她,碑文请你写。”张感到自己写这样的碑文不合适,便提出:“等我回陕北,请中央领导同志写吧!”慰劳工作结

束后,张仲实回到党中央办公所在地——瓦窑堡杨家园子,正好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任弼时书记当晚由延安来到这里。次日,也就是3月25日,张仲实及时向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汇报了慰劳团在战区的慰劳工作,并汇报了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及晋中党委建立纪念碑的意见等。最后,他建议说:“纪念刘胡兰一事,最好请毛主席题词,以示表彰。”任弼时立即向毛主席做了汇报。第二天(即26日),毛主席听取汇报后,即挥笔题写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对刘胡兰烈士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发了刘胡兰慷慨就义的报道。从此,刘胡兰的事迹广为流传,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学习的光辉楷模。^{[17](P48) [29]}中央电视台“红色档案”节目曾评价说到“张仲实派记者采访是使刘胡兰英雄事迹震惊全国的关键”,可以说是张仲实促成了毛泽东为女英雄刘胡兰题词。

新中国建立后,当毛主席得知刘胡兰墓碑因战乱丢失,遂于1957年1月12日刘胡兰烈士就义10周年时,重新题写了同样八个字。^[30]

(二)致信毛泽东请其为《中苏友好》杂志题写刊名并为创刊号题词

1949年10月5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举行4天之后,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朱德、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等领导出席大会,宋庆龄致开幕词,刘少奇发表讲话。会议通过了中苏友好协会章程,并选举国家副主席刘少奇为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宋庆龄、吴玉章、沈钧儒、李济深、郭沫若、张澜、黄炎培等七人为副会长。选出中共高级干部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197人为理事,钱俊瑞为总干事、党组书记,张仲实为副总干事、党组副书记兼研究出版部主任,并主编《中苏友好》杂志。

1949年七八月间,中共中央即决定创办中苏友好协会会刊《中苏友好》,筹办工作交由时任中宣部出版处处长张仲实负责。为筹备编辑创刊号,张仲实特向毛泽东主席致信,请其为杂志题写刊名,并为创刊号题词。1949年10月15日,毛泽东主席复信张仲实:“杂志名称请郭沫若先生写为好。另写了一句话,作为杂志创刊号的题词。”毛泽东的题词是:“我希望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极大地发展和巩固起来。”^{[31] (P18)} (见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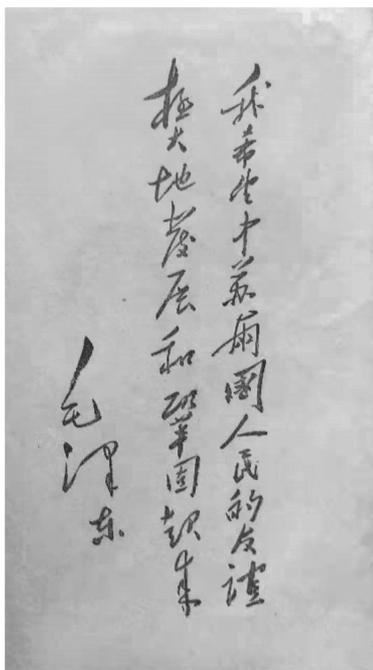


图7 毛泽东主席为《中苏友好》杂志创刊号题词

《中苏友好》杂志为月刊,创刊号于1949年11月1日出版,刊名由郭沫若题写,创刊号上发表了毛泽东主席的题词手迹。张仲实的译作M. P.里雅名著《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一文在创刊号上发表。此后,他连续在1卷2期发表了《斯大林传略》,1卷3期发表了《列宁的生平》及译作《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续)》,1卷5期发表了《莫洛托夫的生平与事业——为庆祝莫洛托夫60寿辰而作》及译作《社会主义与个性》(M. P.康马理著),1卷6期续完《社会主义与个性》,1卷7期发表《苏维埃爱国主义是社会主义底动力——苏维埃社会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之一》,2卷2期续完《苏维埃爱国主义是社会主义社会底动力》,2卷3期发表译作《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苏维埃社会发展底规律性——苏维埃社会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之三》(M.列昂节夫著),3卷1期发表《苏联共产党底政治教育制度》,3卷3期发表《乔治亚共和国三个集体农庄访问记》等。

对于从事中苏友好工作的几年,张仲实本人十分看重。他在晚年所写的《我的经历》中,专列一节《搞中苏友好工作(1949年7月—1953年5月)》做了记述:

1949年4月间,世界和平大会在波兰首都华沙召开世界大会。我国代表团以郭沫若同志为团长、钱俊瑞同志为秘书长出席了会议,6月结束代表团回国。钱俊瑞同志根据波兰的经验,向中央提出一个书面建议,建议

我国成立一个人民群众团体,来开展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友好往来。中央批准了这个建议,并叫中宣部负责这一工作。中宣部安排,由我负责。于是7月初,我就从香山搬进城里住(在西西南大院胡同,家仍在香山下),筹备成立“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十分繁忙。经过三个月的准备,这个组织于1949年10月5日正式成立。成立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十分隆重,所有中央领导同志都参加了,苏联还派了一个“中苏友好代表团”,以作家法捷耶夫为团长,专程前来参加,以示重视。该代表团在参加中苏友协成立大会后,还到济南、南京、上海、杭州等地进行了友好访问活动。华东局山东分局还特别要我到济南去检查那里对接待工作的安排。我于10月5日到济南一趟……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会长是刘少奇,副会长是宋庆龄、吴玉章等。钱俊瑞是总干事、党组书记,我是副总干事、党组副书记,并担任总会研究出版部主任,主管该会全部宣传工作,主编《中苏友好》杂志。实际上我是代表中宣部主管该会的全部工作的。^{[17] (P53-54)}

从有关回忆文章及张仲实保存的部分信函等资料可以看出,张仲实为发起、筹备中苏友好协会做了大量工作,包括起草《发起成立中苏友好协会缘起》等文件。作为《中苏友好》杂志的主编,他曾在刊物的筹备、组稿、编辑、出版等工作中花费了大量心血。尤其是积极主动地组织了包括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许德珩、吴玉章、邓颖超、黄炎培、蔡廷锴、郭沫若、茅盾、萧三、徐悲鸿、朱子奇等各界名人及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各界名人的文章在刊物发表,为提高刊物的影响力,更好地服务协会“建立与巩固中苏两国文化经济和各方面的联系,介绍苏联的建国经验和科学技术,发展和巩固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为争取世界永久和平而奋斗”的宗旨,做出了重要贡献。

六、著文记述毛泽东教导儿子毛岸英到农村接受劳动锻炼

关于毛泽东主席在延安送儿子毛岸英上劳动大学的事,虽已有不少文章、书籍中讲到,但是作为当时与毛岸英同在延安中共中央宣部一起工作的张仲实,却了解其中更多的一些细节,对当时的

情景有着更为深刻的印象。在《张仲实文集》第3卷中,有一篇题为《忆毛主席教导毛岸英同志到农村去接受劳动锻炼》的文章,谈到此事说他始终“牢牢地铭记在”心里,常常使他“回想起来”。

该文写道:“一九四六年初,毛岸英同志从国外(苏联)回到延安,被分配在中宣部工作,当时我也在这里。三月间一天,毛主席对毛岸英同志说:‘你要读两个大学:一个是普通大学,这个大学你已经读过了;另一个是劳动大学,这个大学就是在农村劳动。现在春耕快要开始了,你要到柳林一个劳动英雄那里学农村劳动。’”“毛岸英同志临走前向毛主席告别。中办行政处负责同志到毛主席那里去催毛岸英同志走,说:‘马来了,可以走了。’毛主席一听,觉得不对头,就说‘不要骑马去了。农民一看你骑马来,就不欢迎你了。’”行政处负责同志说:“柳林离这里有三十多里路,背着三十斤米,怕走不到?米由马驮着,人不骑也可以。”毛主席坚决地说:“不行!还是自己背着米走去,好些!”尔后,毛主席又对岸英说:“去后,要住在贫农家里;就在这个贫农家里搭伙,同吃,同住,同劳动,生活要同农民打成一片,不能特殊。”这样,毛岸英就背着三十斤米,徒步走到目的地——延安柳林区吴家枣园,住在劳动英雄吴满有家里,与他们一家同吃、同住、同劳动了一年,到1947年3月从延安撤退时,才离开那里,再回中宣部工作。^{[5] (P279-280)}

关于毛岸英在延安上劳动大学之事,虽几个版本所述基本史实相同,但也尚存在某些歧异。如一种说法认为,毛岸英是1946年3月到的柳林,1946年秋天以胡宗南为首的国民党军队开始进攻延安时,离开那里,在柳林劳动锻炼半年时间。而张仲实的说法则是:毛岸英是1946年3月去的柳林,1947年3月中央机关从延安撤退时,才离开那里,在柳林劳动锻炼一年时间。关于锻炼的时间,可以再查找资料,进一步考证。然而,关于毛主席不准中办同志让毛岸英骑马去柳林这一重要的细节,却尚未见其他文章或资料提到。张仲实该文不仅补充了以往有关史实上的重要遗漏,而且从中充分表现了他对毛泽东主席早在延安时期就坚决抵制、反对特权,以身作则,严格教育、培养下一代的思想、情怀的十分钦佩,以致始终铭记在心,常常想起。。

毛岸英1922年出生在湖南长沙清水塘,1930年母亲杨开慧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此后年仅8

岁的他在上海领着两个弟弟以拾破烂、检煤渣、推人力车谋生。1936年,党组织送他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等校学习深造,其间参加了苏军反攻德军的战争,为苏联的卫国战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延安吴家枣园劳动锻炼期间,他穿着毛主席打过补丁的旧灰布衣裤,一身农民打扮,与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一家同吃、同住、同劳动,经历了思想、生活和艰苦劳动的锻炼。在村里人的眼中,他没有架子,干活有模有样,受到欢迎,与农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收获很大。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年,毛岸英还从北京给吴家枣园寄去一封信问候大家,不忘这个他曾锻炼过的“劳动大学”。1950年,他奔赴朝鲜战场保家卫国,光荣牺牲。毛岸英此后的表现,表明了他不愧为劳动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中国人民真正优秀的儿子。

七、整理、选编毛泽东有关专题重要论述成书成文

(一) 编选出版了《马恩列斯毛论农民土地问题》

1947年7月10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工委书记的刘少奇自河北西柏坡向中共中央报告全国土地会议准备情况,其中说道:“对于会议,我们只印了马恩列斯论农民土地问题,及我党历次关于农民土地若干文件作为参考外,无其他准备”。7月27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土地会议进行的方法”^[32](P251)。此处刘少奇报告中所说的《马恩列斯论农民土地问题》,即是由张仲实负责编辑、由晋察冀新华书店正式出版发行的《马恩列斯毛论农民土地问题》。张仲实在该书书末的附志中写道:“此书系我为1947年八九月全国土地会议编的。是年5月下旬,我随中央工委从晋西北临县三交到晋察冀辖区平山县洪子店附近西柏坡村后约一周,被通知要为全国土地会议编辑一本这样的参考资料。因西柏坡村没有任何藏书,我为完成这个任务,专程到晋察冀中央局(驻阜平县城南庄,距西柏坡一百五六十里)去编的。历时一个半月。”^[21](P93)这本书是由晋察冀新华书店1947年7月出版的。需要说明的是,刘少奇给党中央的报告里说的是马恩列斯四位革命导师论农民土地问题,而不包括毛泽东。但事实上,张仲实编就、正式出版的则是《马恩列斯毛论农民土地问题》。

1947年,党中央发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这一鼓舞人心的指示,并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解放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张仲实积极投身于这一伟大的社会革命运动。配合全国土地会议的召开,他遵照中央工委的指示,专门到晋察冀中央局搜集资料,日夜奋战,在条件十分艰苦困难的情况下,用一月多时间完成了《马恩列斯毛论农民土地问题》的编选。该书在《封建制度下的农民》《资产阶级与农民》《无产阶级与农民》《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等专题下精心选辑了革命导师大量重要论述,其中精选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合作社》《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组织起来》等文章中的重要论述17条,并全文收录了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农村调查”序言》两篇重要文章。该著所选五位革命导师论述,深刻地阐明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中国革命只有正确解决这个同盟军的问题,无产阶级才有可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该书的出版发行,为广大解放区参加土改工作和研究土地问题的同志及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武器。

(二) 编选了包括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相关重要论述的《整党问题参考资料》10辑

在全国土地会议期间,张仲实作为大会秘书处工作人员还曾负责整理、编辑《土地调查报告》10种。全国土地会议之后,他接着又参加了晋察冀土地工作会议,担任大会秘书。受大会主席团委托,他精心选编了《整党问题参考资料》10辑。该资料在《论党的性质》《论群众路线》《反对自由主义》《论自我批评》《科学的领导方法》《论清党及新党员入党条件》《共产主义的人生观》等10个专辑中选录了马、恩、列、斯、毛及中央有关文件的重要论述,是一部珍贵的党建理论文献。据笔者统计,该资料共从毛泽东《组织起来》《反对自由主义》《论联合政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农村调查序言》《兴国调查》《论合作社》《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等文章中摘录有关重要论述17条,并全文收录了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这一时期,他还在城南庄附近参加了实际的土地改革工作。时任朱德总司令秘书的黄华1947年12月29日在给张仲实的信里写道:“请你把参加城南庄工作的经验,特别是对支部党员的工作及团结中农的工作经验,有机会时来信告诉我们。这一方面我们尚做得很少,办法也很少。”^[21](P94)从此信及其他信件的内容中可知,张仲实在土改中认真执行党的路线和

政策,创造了不少先进经验,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受到了组织和同志们的肯定与赞扬。

(三)系统、全面地整理阐释了毛泽东关于理论著作翻译的论述

在1980年第4期《新华文摘》上,张仲实发表了《毛泽东同志论理论著作翻译》一文,该文中他所引述的毛泽东有关理论著作翻译和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均为他在有关会议上当面聆听或从有关文件中看到而随笔记下来的,相当系统,不少属于首次披露,具有十分珍贵和重要的理论文献价值。

在该文中,张仲实特别赞赏毛泽东对翻译工作和理论工作的重要意义和价值的高度肯定。他写道:“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对理论著作翻译一向极为重视。从我的笔记本里所记下的可以看出,自延安起,在党的一些会议上,他多次谈到这种翻译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做好这一工作。”“早在1945年4至6月,在延安,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讲话中,针对当时有些同志对理论著作翻译不安心,就曾两次谈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指出这种翻译工作本身也是党的‘理论工作’。”他在该文里写道,在党的七大开幕式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翻译的同志很重要,不要认为翻译工作不好。我们现在要大大翻译。我是一个土包子,要懂一点外国事,还是要靠翻译。我们党内能直接看外国书的很少,凡能直接看外国书的,首先要翻译马、恩、列、斯的著作,苏联先进的东西,各国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还有历史上许多东西,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但带有进步意义的东西,还有一些民主主义的东西,我们都要翻译。因此,我们要重视理论工作者,看得起他们,把他们看成我们队伍中很有学问的、有修养的人,要尊敬他们。”5月31日在党的七大闭幕式上,毛泽东在总结性讲话中又强调说:“对理论工作看法的动摇是不对的,似乎这工作不要紧,许多人重视理论工作,我们对那批人,就是说,翻译书的,写理论文章的,要看得起。应大胆去搞,并要把它搞好。碰到一些人就和他们谈谈。因为没有这些人,就看不懂外国书。这些人翻译了几本外国书,是很好的,很有功劳。即使你一生一世翻译了一本书,也是功劳。……不要轻视搞翻译的同志,没有翻译就没有共产党。同志们,如果不搞一点外国的东西,中国晓得什么是马列主义呢?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比如唐僧取经里头有孙

猴子、猪八戒、沙僧一块到西天取经,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回来。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取经回来后,设翻译馆,就翻经。”在张仲实看来,毛泽东一句“没有翻译就没有共产党”,把翻译工作的重要性讲透了。^[33]

1945年党的七大时,张仲实作为大会秘书处工作人员,听取了大会所有报告和发言,关于毛泽东主席上述讲话,他的记录应是较为全面、准确的。

在该文中,张仲实还特别强调了毛泽东多次提出的要给译出的理论著作写序言、加注释。他写道:“从前有的理论著作翻译工作者不给译出的书写序言、加注释,毛泽东对此种现象很不满意。解放后,他在党的会议上一再强调,要给译出的书写序言、加注释。1958年1月3日他在中央杭州会议上严厉指出,以后翻译的书,没有序言,不准出版。初版要有序言,再版修改也要有序言。《共产党宣言》有多少序言?许多十七、十八、十九世纪的东西,现在如何看它们,这也是理论和中国实践的结合。这是很大的事。”同年1月16日,毛泽东在中央南宁会议上又强调指出,“过去译的书,不写序言,是表示在马克思面前不敢赞一词!”1965年12月在中央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译出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但要写序言,而且要作注释。”^[33]张仲实本人所译著作,大都写有译者序言,并做了注释。

张仲实十分赞赏和推崇毛泽东关于理论著作应“硬译”的观点,并对之做了极为充分的分析论述。他在文中写道:“毛泽东同志对理论著作的‘硬译’有过指示。这是他在1956年8月24日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提到这个问题的。当时他说,鲁迅是民族化的,但是他还主张过硬译。我倒赞成理论书硬译,有个好处:准确。”他特别联系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翻译界曾经发生的“顺译”“活译”与“硬译”“死译”的论战,引用瞿秋白的话批评赵景深、梁实秋等一些评论家“宁错而务顺”的主张,“既然要宁可错点儿,那就是要蒙蔽读者,使读者不能够知道作者的原意。”他十分赞成鲁迅先生所肯定的“信而不顺”即“硬译”的主张,反对“顺而不信”即所谓“顺译”的翻译。^[33]他指出:鲁迅在《几条“顺”的翻译》一文中说:“‘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令人迷误,怎样想也不会懂,如果好像已经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34](P335)}新

中国成立后,关于理论著作翻译方法问题也曾有过争论。而张仲实认为,当时毛泽东关于“赞成理论书硬译”的指示,“对理论著作翻译工作者指出了方向”;“硬译”,虽文字诘屈聱牙,读者看起来感到不“顺”,但翻译理论著作时,必须坚持意思准确,不走样,就这一点说宁可“信而不顺”,也比“顺而不信”要好上上万倍。作为一生从事理论著作翻译的大家,他在文中亦讲了自己感想:“当然,对这一指示我的体会是,并非一味盲目地要提倡‘硬译’,而只是在‘信’和‘顺’不能两全其美的情况下,才要突出‘硬译’,宁可‘信而不顺’。”^[33]他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论翻译〉》一文中,对马、恩如何看待翻译工作、翻译的原则和标准、做好翻译工作必须具备的条件等问题的论述做了深入阐释,一再强调了理论著作的翻译要以直译为主,达到忠实流畅,以求准确地表达原文原意;尖锐地批评了“宁顺而不信”,宁可“错”点儿,认为“这是蒙蔽读者,欺侮不懂外语的读者”。^{[19] (P572-578)}张仲实关于理论著作翻译的文章,得到了理论界、翻译界同行的高度肯定和赞赏。著名美学家、翻译家朱光潜先生在《对“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编译的意见》一文中,就曾讲到:“张仲实同志在1979年《译讯》第4期里所发表的《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论翻译〉》一文,对一切翻译工作者都是切中要害的苦口良药,我建议把它公开发表,规定每个翻译工作者都应把它奉作指南。”^[35]

(四)参加党的《毛泽东选集》翻译工作会议

1951年7月9日,为做好《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工作,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召集了党的翻译工作会议。张仲实与胡乔木、王稼祥、李立三、陆定一、师哲、张西畴、曹葆华、何匡(编译局)、姜椿芳(时代出版社)共十人出席会议。会议讨论了《斯大林全集》的翻译工作和《毛泽东选集》俄译的校译问题等。7月10日,胡乔木就会议情况向毛泽东主席并中央写了报告。^{[36] (P265)}

20世纪50年代初,我党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1950年,在毛主席访问苏联期间,斯大林对毛主席著作的重视、关切,加速了编辑出版工作的进程。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赢得的。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十分需要依靠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已把编辑毛主席著作、出版《毛泽东选集》提上了日程。在毛主席访苏期间,斯大林主动向毛主席谈起此事。

斯大林曾说:“他们想得到毛泽东著作目录,以便翻译成俄文,这样可以帮助世界人们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吸收中国革命的宝贵经验。”毛主席回答说,他正在审读自己的著作,因为这些著作是由各地方出版社出版的,有很多错误和歪曲之处。他计划到1950年初审读完毕。毛主席提出,苏联在编辑经典著作方面是有丰富经验的,能否指派一位有造诣的同志到中国来。斯大林当场答应可以派尤金去。斯大林向毛主席介绍,这个人你们可能不熟悉,他有理论修养。斯大林还很客气地征求毛泽东的意见:“你看合适不合适?”毛主席爽朗一笑,表示欢迎。^{[37] (P105)}1950年3月4日,毛主席从苏联回到北京,5月,在他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斯大林提出的要把毛泽东著作译成俄文的提议,与会者一致赞同,都认为这是迫切需要做的事。会议做出决定,立即正式成立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不久改称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刘少奇担任主任。^{[36] (P263)}1951年7月9日,张仲实参加的党的翻译工作会议,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工作会议,对促进《斯大林全集》中译和《毛泽东选集》编辑及俄译工作意义重大。

八、张仲实对毛泽东生平及毛泽东思想的研究、阐释

1940年到延安以后,张仲实有了条件静下心来潜心学习、钻研马列主义理论和毛泽东的著作。1940年12月,为纪念列宁逝世十七周年,他撰写了一篇十分重要的理论文章——《掌握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在该文《学习列宁和斯大林的榜样——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一节里,他由衷地写道:“中国共产党在自己二十年来的革命斗争中,尤其在最近十余年来的艰苦斗争中,曾经光荣地粉碎了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者——陈独秀派、托派(早已成为日寇的走卒)、罗章龙派、李立三路线、张国焘路线,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纯洁性。它在不断的实践斗争中已经壮大起来,而成为真正的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了。现在它以毛泽东同志为首,不仅已经正确地把握了创造性的马列主义,不仅已经学会了娴熟而正确地把握马、恩、列、斯的学说应用于中国的环境,而且在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问题上,已经向前推进了马列主义,已经给马列主义的‘总宝库’提供了好多新的贡献,增添了许多新的珍贵东西。毛泽东同志的

《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是中国的最优秀的、真正马列主义的作品。……是中国共产党现在跟世界上其他各兄弟党比较,可引以自傲的地方。”在该文里,张仲实还具体地分析了毛泽东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具体环境”,认为在这一点上,他“有着卓越的指示”。他引用毛泽东在《论新阶段》里的话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干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12]

在该文中,张仲实还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应用于中国具体环境而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发展所做出的新贡献做了高度概括和分析,指出最主要的有四点:

第一是关于建立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这个问题在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问题的理论里面,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同志为首,从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出发,并根据1925—1927年及其后十年的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的新的历史条件之下,正确地策划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统一与斗争的原则,辩证地了解 and 运用起来,不仅发动了中国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并且在理论上展开了和在实践上坚持了这一战争,使中国革命运动获得了飞跃的发展。因之,在这一点上,使马列主义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问题的理论与执行,更加具体化,更加发扬光大了。

第二是关于革命的武装力量问题。从前一般盛行一种观念,以为只有在直接起义时,才能从事组织革命的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同志为首,则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与长期性,纠正了这一有害的与马列主义精神相反的错误观念,而在

革命过程中就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的武装力量,并建立了革命的、抗日的民主模范根据地,保证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光明的前途。

第三是关于革命的军事战略和战术问题。过去一般把游击战争视作一种不重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同志为首,在自己的革命斗争中,根据马列主义观点,在理论上和行动上,将游击战争发展成为被压迫者在一定条件之下反抗压迫者的一种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革命战争。今日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广大的抗日游击队伍在敌后所进行的广大的游击战争,在中国民族解放战争中,与正面的正规战相配合,起了重大的作用。毛泽东同志的《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不仅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军事指南,而且是马列主义在军事问题上的发展。

第四是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政权问题。文章讲到,在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性质,乃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同志为首,从列宁、斯大林关于工农民主专政和国家问题的学说出发,根据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的理论。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是对中国革命现阶段国家问题的指示,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关于建立革命政权问题的指南;同时也就是马列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问题理论的新贡献。^[12]张仲实1940年所概括的以上四点贡献,实际上已经比较准确地揭示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十分难能可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张仲实还在多篇有关文章中深入地研究、阐释了毛泽东的生平思想,其重要的见解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提出马列主义中国化是摆在中国马列主义者面前的一个主要任务

在《掌握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张仲实分析指出:“虽然,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准,比较以前已经巨大地提高了,马列主义的修养,比较以前已大有进步了,可是这还不够的。当前还有好多重大的理论问题,需要加以深刻的马列主义的研究与分析。因此,学习列宁、斯大林的榜样,精通创造性的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应用分析中国具体环境和社会特点,一句话,使马列主义中国化,这是摆在中国马列主义者面前的一个主要任务。”他特别引用毛泽

东同志在《论新阶段》里的话分析指出：“研究这个运动(指当前的——实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时刻睁大眼睛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你就不过是一个西班牙的唐·吉珂德，再加一个中国的阿Q，而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引用毛泽东“学习理论是胜利的条件”一语，特别强调：学习革命理论，“只有掌握了创造性的马列主义，中国革命的胜利，才会有彻底的保证！”指出“这就是我们在纪念列宁的时候所要紧紧记住并积极努力的一点。”^[12]自毛泽东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年11月25日《解放》周刊第57期以《论新阶段》为题发表其在六中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所作的政治报告，张仲实即在到延安短短半年时间，就思考、研究这一重要问题，著文对之做了深入论述，其有关见解极为新颖，分析亦透彻清晰，颇有理论说服力。

(二)鲜明地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应该紧密团结在毛泽东同志旗帜之下”

在1943年9月21日发表的《学习季米特洛夫同志的英勇斗争的榜样》(载延安《解放日报》)一文中，张仲实一方面以十分崇敬的心情赞颂了季米特洛夫10年前(即1933年)在德国法西斯法庭前面英勇不屈，进行反法西斯主义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精神，认为他“丰富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给了共产党人一个明显的榜样：在敌人的法庭前面，应如何坚持党的立场，如何保持自己的革命节操，如何利用一切可能去进行革命的宣传，以及如何进行斗争才能获得胜利”。另一方面，深入分析了“生存在阶级斗争特别尖锐特别残酷的条件之下”的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斗争环境，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纪念莱布齐审判十周年，应当学习季米特洛夫同志英勇斗争的榜样，“更应该紧密团结在毛泽东同志旗帜之下，为保卫自己的党而斗争，为中国抗战的胜利与中国人民的利益而斗争，为实现全世界全中国反法西斯主义的胜利而斗争。”^[38]在该文里，作为理论家的张仲实鲜明地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应该紧密团结在毛泽东同志旗帜之下”的口号，这在1943年无疑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三)提出整风是毛主席在党建方面对马列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

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一文里，张仲实分五个

方面对整风前的党内思想状况、整风运动的几个阶段、整风的方法、整风运动的优点、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意义做了概括分析。他特别强调指出，延安整风运动“为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在党的建设上有巨大的意义”；他尤其高度肯定：“整风是实现思想建党的最好方式，这是毛主席在党建方面对马列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19](P270—272)

以上张仲实所论，鲜明而深刻地揭示出了延安整风与中国革命的胜利、与建党理论创新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四)较早也较全面系统地对毛泽东生平及思想做了研究阐释

党的“七大”以后，张仲实在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20余年历史的基础上，撰写了《毛泽东传略》《朱德传略》，对两位革命领袖的革命经历和贡献、尤其是对毛泽东思想做了初步系统的总结和概括。在《毛泽东传略》中，他首先提出并充分论证了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杰出的领袖”，是一个“创造了完整的中国化的思想体系”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毛泽东“是从近代中国四次伟大的革命斗争——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中锻炼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杰出的领袖”。他首先是一个“大革命家、大组织家、大行动家”。“五四”以后他“变成了坚强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此后的中国三次革命中，他成为“革命的组织和领导者”。他“头一个把农民问题提高到应有的位置”，“发动和组织了千百万农民大众的民主势力起来反对乡村封建势力的革命运动”；他“创造了广大的苏维埃区域和工农红军，确定了各项政策与红军的战略战术以及政治工作”；他“提供了抗战的正确道路，批判了各种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错误思想，反对了各种投降主义，创造了广大的解放区和强大的人民军队——八路军新四军”；他“善于表现和组织人民的意志和要求”，“在革命的高涨时期，毛泽东善于领导广大群众进攻；在革命运动的低落时期，毛泽东又善于领导群众退却”。

其次，提出毛泽东创造了完整的中国化的思想体系。他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大思想家、大理论家，是一个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善于用辩证唯物论及历史唯物论的方法分析复杂的环境

和问题”，“善于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把它提高到理论的原则上去”；“他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坚固的基础上，从中国民族特点出发，吸收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极丰富的斗争经验，创造了完整的中国化的思想体系”。他特别指出，毛泽东在对中国国情的分析、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党的建设的理论与政策等等方面，“都发展了、丰富了、补充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再次，提出毛泽东还“是一个伟大的军事战略家”。他认为，毛泽东能够“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出发，天才地创造了完整的中国人民武装斗争的战略战术”。在工农民主革命初期，他就“创造了有名的‘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创造巩固的根据地、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以及‘诱敌深入’等游击战、运动战等战略原则”；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创造了持久战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原则”，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其他军事著作是“最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著作”^[19]（P360—368）。这是我党关于毛泽东生平及思想的较早也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是对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的深入论证，对此后我党进一步科学、全面地认识、阐释、评价毛泽东思想很有参考价值。

（五）对学习毛泽东著作提出了重要见解

作为一位理论家，张仲实长期以来十分重视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和研究，一方面他在到达延安之后所发表的诸多文章中大多论及了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理论宝库的丰富、发展以及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贡献，同时对如何学习、研读毛主席著作多有思考和探索。这其中有两点尤其值得重视：一是他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非常认真，曾对有关毛主席著作的思想内容做过相当准确的阐释和概括，为引导读者更好地学习、理解和掌握原著的理论观点和基本精神提供了帮助；二是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对学习、研读毛主席著作的重要性及应持的态度、方法等做了论述，为帮助人们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学习、研读毛主席著作提供了指导。

1976年，张仲实曾撰写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学习提纲》^[19]（P499—502）一文，在对该卷《毛泽东选集》所收70多篇文章深入学习、研究的基础上，对其所处历史背景、其时革命形势的发展阶段

以及全卷的主要思想内容，尤其是理论创新点做了准确的概括和简要的分析。文章指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写作的历史背景正好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时期的四年，“是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两种政权斗争的时期”；从编入这一卷的著作，我们“可以领会毛主席曾经如何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以内是怎样取得胜利的”。文章分四个时段对解放战争期间革命形势的发展做了概括分析，并将各阶段的著作分作四组，指出各组的“基本著作”与内容中心。如：第一组（1945年8月15日至1946年6月的文章），基本著作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它“决定了党的大政方针”；中心是“和平与战争，如何认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本质，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第二组（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的文章），基本著作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制定了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如何打法”；中心是“反对右倾……如何作战、如何歼灭敌人，如何打法、如何成为人民战争”。第三组（1947年7月至1948年6月的文章），基本著作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制定了战胜敌人、争取胜利的方针政策，系纲领性文件；中心是“党内继续反右，并注意‘左’，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争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其次，加强党的纪律”。第四组（1948年7月至1949年9月的文章），基本著作是《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阐述了如何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全国胜利后的国体——人民民主专政”；中心是“如何把革命进行到底”。

在该文中，张仲实还对该卷的重要理论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梳理概括，特别指出：“本卷所编入的著作，十分重要，在一些问题上大大地向前发展了马列主义理论，并以新的经验大大地丰富了马列主义理论。”他概括的理论问题主要有以下七点：

（1）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又联合，又斗争。陈独秀、多列士、陶里亚蒂。敌人的本性，政治欺骗与军事消灭，人民也要做两手准备。

（2）战争问题：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如何打胜，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结果，我由弱到强，由小变大。

（3）战略思想和战术思想问题：“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是从它们的本质说的。

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敢于斗争。在战术上要慎重,要讲究斗争艺术,要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采取适当的方式,一步步地孤立和消灭敌人。

(4)统一战线问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争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敌人的土崩瓦解,并不等于我们的胜利。要团结大多数。

(5)党的建设问题:一是反对各种错误倾向,右是战略上把敌人看的了不起,左是战术上轻视敌人。二是加强党的集体领导作用——党委制,提出领导方法十二条。三是重视党的组织。四是反对无政府状态,加强纪律——请示报告制度。

(6)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分两步走:1948年12月全国胜利在望,提出把革命进行到底,指出转变的两个条件已具备:政治——无产阶级领导权,经济——没收官僚资本;七届二中全会:基本矛盾,提出转变的规划——三大改造。

(7)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有选举权,说服教育不采取强制办法;对敌人是专政,不许乱说乱动。

从以上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思想内容所作的高度概括和提纲挈领式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出,张仲实对该著是下大功夫学习、钻研了的,透彻地理解和掌握了全书思想精髓;也反映出他对毛主席著作学习的态度极其认真、扎实,以及理论学识的深厚。该文无疑会对人们学习、钻研毛主席这部重要著作起到极大的启迪和帮助。据该“学习提纲”的行文,笔者初步判断,其很可能是张仲实为本单位(或某单位)人员所作的学习辅导报告稿。

1959年8月2日,张仲实在《北京日报》发表了《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一文,阐述了他关于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思考和见解。文中引述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同革命性结合起来”,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正是把这种科学性和革命性两者结合起来的典范”。文章进一步论述道:“举世公认,毛泽东同志是马列主义理论巧手,他十分巧妙而熟练地把马列主义理论的普遍真理同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他处处冷静地分析客观形

势;同时,又估计到人民群众的毅力、创造性和首创性。唯其如此,他总是创造性地解决了我国革命每个发展阶段上的复杂的实际问题,不论在人民民主革命阶段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都引导了党和人民节节获得辉煌的胜利。唯其如此,他在各方面向前发展了马列主义理论,用我国革命的新的经验充实和丰富了它。所以,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对我们也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他还特别分析指出,毛主席的著作是我国革命经验的总结,而他的阐述又是深入浅出,不论多么深奥的道理,他都用几句通俗生动的話,讲得那么透彻、明白、好懂。由此,张仲实提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首先应学习毛主席著作。他写道:“我以为,一般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同志,都应该首先系统地深入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每个有研究能力的同志更应该钻研和通晓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只有这样,才能大大地提高工作的思想性,很好地贯彻党中央的方针和政策。”他还引述列宁在革命最困难的转变关头经常“请教”马克思,重新反复阅读和思索马克思著作,以便从中找出答案的例子,强调指出:“我们也要学习列宁钻研马克思著作的方法来钻研毛泽东同志著作,遇到困难问题,就‘请教’毛主席,重新反复阅读和思索他的著作,学习他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只有这样,学习才能深入。”^[39]

1964年6月27日,张仲实在寄赠侄孙新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甲种本)的扉页上认真地写了一段话,亦充分地体现了他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什么以及怎么学的见解:

学习毛泽东思想,就是学习他的立场、观点、方法。他的立场,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为本国最大多数人和世界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奋斗的立场。他的观点就是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他的方法,就是调查研究,办法就是蹲点、搞典型调查。

要掌握毛泽东思想,就得经常阅读此书,特别是遇到什么困难时,要选读其中有关的文章。读时,主要就是领会文章的精神实质——立场、观点和方法,并要联系自己的思想,不怕重读,只要方法对头,读上一两遍、三四遍、及至十遍、百遍、千遍,都觉得读而不厌,获益不浅。^[40](见图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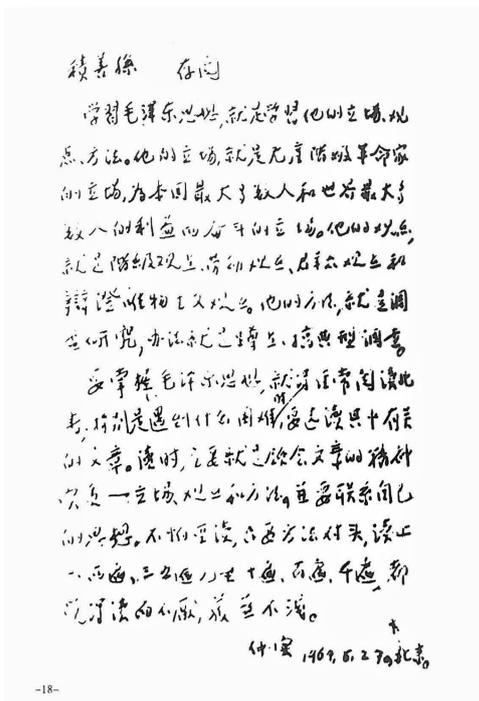


图8 张仲实在赠侄孙张凯(原名张积善)《毛泽东选集》(甲种本)扉页上的赠言

他在写给子女、孙辈的不少信函中,亦多次强调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首先要花功夫学好毛主席的著作,掌握毛泽东思想。学习要理论联系实际,自觉改造思想,善于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工作实践,学以致用。

由于已有资料所限,尤其查找档案不易,本文关于张仲实与毛泽东之间的交往,可能还有不少史实尚未发现、尚未讲到,这只能等待以后对新资料的发掘再作探讨了。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告诉我们,推翻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依靠的是党领导的文、武两支军队;而今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实现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同样也必须建设好这两支军队——一个能打胜仗的现代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能够自觉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善于以之教育人民、凝心聚力、团结奋斗的文化军队。而要建设好这样两支军队,有效的宣传思想工作根本的保证。只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全国人民,真正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文化素质,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才是不可战胜的。为此,我们必须继承发扬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的优良传统,充分尊重、真诚爱护理论、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充分调动、发挥知识分子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切实提高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和理论建设的能力和水平,唯此,才有可能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思想支撑、理论指导。

张仲实一生60余年主要在党的理论建设和宣传思想战线工作,他与毛泽东的交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列主义理论著作翻译、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高度重视,对从事理论工作的知识分子的充分尊敬、信任和保护,从中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一百年来马列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以及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和理论建设工作演变的历史。

注释

- ① 区梦觉,1926年入党,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先后担任广东妇女解放协会主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在延安担任中国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等。人称“岭南女杰”,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党的五大、七大代表,八大中央候补委员,十二大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 ② 张仲实在《言犹在耳 记忆仍新——对周恩来同志的回忆片断》一文中写道:“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同志被癌症夺去了生命。……9月下旬,周恩来同志要我为党中央草拟致韬奋家属的唁电。我拟毕送周恩来同志,他圈点勾画,仔细批阅,这足见他对韬奋同志逝世的莫大痛惜。……”(1985年1月8日《人民日报》)
- ③ 张仲实在《我的经历》中讲道:“1949年2月,七届二中全会时,中央叫我提出一个学习理论的计划,我就同胡乔木同志商量,拟定了一个学习书目,经中央批准。这就是‘干部必读’十二种书”。(详见张积玉、王钜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张仲实》,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2页)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1937—1949):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 [3]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 [4] 本报特讯.各界代表齐集南门外热烈欢迎朱总司令及茅盾张仲实两先生[N].新中华报,1940-05-31.
- [5] 张仲实文集:第3卷[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 [6] 张复.从父亲与毛泽东见面赠书说起——也谈善于学习的毛泽东:上[J].中华魂,2010(07):5-9.
- [7]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8] 崔艳红.中共留苏学员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贡献[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02-21(08).
- [9] 熊复.我的马克思主义启蒙导师[M]//张积玉,王钜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张仲实.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 [10] 张仲实.译者的几句话[M]//斯大林论民族问题.上海:生活书店,1939.
- [11] 毕云程.韬奋和生活书店[M]//邹嘉骊.忆韬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 [12] 张仲实.掌握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为纪念列宁逝世十七周年而作[J].解放周刊,1940(123).
- [13] 刘益涛.毛泽东在延安纪事[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 [14] 邓力群.回忆延安马列学院的整风运动[M]//任文.我所亲历的延安整风:上册.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 [15] 邓力群.邓力群自述(1915—1974)[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 [16]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延安时期大事记述[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 [17] 张仲实.我的经历[M]//张积玉,王钜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张仲实.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 [18] 李富春致张仲实信(1944年5月2日)[M]//张积玉,王钜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张仲实.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 [19] 张仲实文集:第1卷[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 [20] 李忠全.中国社科院老干部参观团活动纪实[J].翻译通讯,1984(05).
- [21] 张复.仲实:张仲实画传、忆念与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 [22] 于天存,于波.欧风亚雨 虎穴龙潭——抗日救国传奇人物于炳然传[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6.
- [23] 温济泽.毛主席审定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M]//陕西出版史志资料(第4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
- [24] 本书编辑委员会.《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例言[M].延安:解放社,1942.
- [25] 张仲实.怀念邹韬奋同志[N].解放日报,1978-07-24.
- [26] 李文.延安各界悼念邹韬奋先生纪实[J].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老同志联谊会《联谊通讯》,1990(16).
- [27] 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28]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恩室.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29] 张仲实.回忆任弼时同志二三事[N].人民日报,1984-05-13.
- [30] 马明.女英雄刘胡兰报道回顾[J].中国记者,2019(10):16-18.
- [3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32] 闫建琪.刘少奇年谱(增订本):第2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 [33] 张仲实.毛泽东同志论理论著作翻译[J].新华文摘,1980(04).
- [34] 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 [35] 朱光潜.对“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编译的意见[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05):6-8.
- [36] 程中原.胡乔木与毛泽东邓小平[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
- [37] 刘金田,吴晓梅.《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 [38] 张仲实.学习季米特洛夫同志的英勇斗争的榜样[N].解放日报,1943-09-21.
- [39] 张仲实.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N].北京日报,1959-08-02.
- [40] 张维新.我的叔父张仲实[J].关山,2021年创刊号.

(责任编辑 张东茹)

Research on Several Historical Facts of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Zhang Zhongshi and Mao Zedong ZHANG Ji-yu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19, Shaanxi)

Abstract: Zhang Zhongshi, a theorist and translator, and Mao Zedong, the leader of the people, met in Yan'a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After that, they had many exchanges in the long-term revolutionary work and theoretical activities. From 1940 to his death in 1987, Zhang Zhongshi mainly worked in the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e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other organs directly under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so h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either participate in the meeting convened

by Mao Zedong, or to attend the meetings in which Mao Zedong attended and gave speeches, or to serve in an organization led by Mao Zedong, or to participate in important work presided over by Mao Zedong, or to draft a work plan that is instructed by Mao Zedong, or his suggestions are adopted by Mao Zedong, etc. During 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in Yan'an, Zhang Zhongshi went to the transportation team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Yangjialing to do mass work. He was selected as a model worker in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because of his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and was publicly named and praised by Mao Zedong at the conference. During his lifetime, he wrote many articles to study and explain Mao Zedong Thought, and wrote the book *Biography of Mao Zedong*, which made a high-level summary of Mao Zedong's revolutionary life and his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Studying and investigating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Zhang Zhongshi and Mao Zedong's communication can not only enrich research materials on the study of their lives and thoughts, but also pres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o Zedong and intellectuals from one side, and more profoundly explain the ideological tradi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its leader Mao Zedong respecting knowledge and intellectuals, and caring for talents, get a glimpse of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propaganda and ideological work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provide fresh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Marxism and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Key words: Zhang Zhongshi; Mao Zedong; propaganda and ideological work;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PC; research on figur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PC